

僧人纂道志：乾隆《桃源洞天志》考略

王志强

提要：湖南省图书馆馆藏释兰岩《桃源洞天志》不但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收的孤本，而且是后世《桃花源志》系列志书的开创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该志书为桃源洞天在桃源县起到了很好的正名效果。释兰岩以僧人身份编纂道教的洞天方志，这在中国方志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举措，反映了我国宗教关系和谐的一面。目前学界关于《桃源洞天志》的作者、编纂缘由等问题含糊不清，有必要厘清。

关键词：释兰岩 《桃源洞天志》 编纂缘由 文献价值

中国传统方志除了主流的郡县志外，还有一部分是记载佛寺道宫的专志。目前学界对这类志书的研究较为深入，大量学者从宗教学角度探讨佛道专志的价值和意义，以进一步推动中国宗教研究的发展。佛道专志普遍是由信徒所纂，然在中国三教合一的宗教理念下，佛道专志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即信徒纂他教志书的情况，如佛教高僧释广宾纂、释际界增补的《西天目山志》记录的是道教第三十四洞天“太微元盖洞天”、释兰岩纂的《桃源洞天志》记载的是道教第三十五洞天“白马玄光之天”。尤为令人讶异的是，僧人们在自序中直截了当地说出他们的纂写缘由乃是因为这些名山洞天没有专志，故生发出纂修之念。以佛徒的身份特意去为道教洞天纂修方志，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目前学界罕有人注意。事实上，这种文化现象是我国宗教和谐的一大表现，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 《桃源洞天志》的作者及书名

湖南常德市桃源县的大士阁住持释兰岩在乾隆年间纂有《桃源洞天志》，现藏于湖南图书馆，藏板为“花源藏板”，以黄纸印造，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收的孤本。该书为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封面题为“楚南桃源洞志”，并刻有“乾隆甲戌年刻，洞天兰岩辑”^①字样。全书不分卷，仅以章节来标识内容，卷首有释兰岩的《桃源洞天草述》，卷中附有释兰岩手绘的7幅木刻山水画。简而言之，该志是一部具有浓厚个人特色的名山志。

目前学界关于《桃源洞天志》的作者问题含糊不清，疑误较多，很有梳理考证的必要。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桃源洞天志》的作者是释兰岩还是释一休，有学者认为乾隆和同治时期先后纂辑出两本《桃源洞天志》，如应国斌在点校本《桃花源志略》的前言中说：“清朝乾隆年间，释一休辑有《桃源洞天志》……到清同治五年，僧人兰岩纂成《桃源洞天志》。”^②应国斌认为释一休和释兰岩分别纂有《桃源洞天志》，前者在乾隆年间，后者在同治年间。然而，在“花源藏板”《桃源洞天志》卷首的《桃源洞天草述》结尾处，清楚地写着“甲戌季秋重阳后二日释兰岩一休撰”^③，书中的章节下面也多次出现“兰岩一休撰”的字样，可知释兰岩便是释一休，一休只是释兰岩的字。同治年间的《桃源洞天志》实为翻刻乾隆《桃源洞天志》的本子，

①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乾隆十九年花源藏板刻本，第2页。

② 唐开韶、胡焯编纂，刘静、应国斌校点：《桃花源志略》，“前言”，岳麓书社，2008年，第6页。

③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第4页。

《中国旅游文献书目选编》就说：“《桃源洞志》，（清）释兰岩撰，同治年间补刊乾隆年间本，一函四册。……《桃源洞天志》，兰岩一休撰，一函三册。”^①因此，释兰岩的《桃源洞天志》前后刊刻了两次，而不是如应国斌所说释兰岩和释一休两人各撰写过《桃源洞天志》的情况。

其次，还有学者认为《桃源洞天志》的作者为唐待徵和释兰岩共撰。如《湘人著述表》就说：“《桃源洞天志》一卷，唐待徵、释兰岩撰，清同治五年（1866年）刻本。”^②然根据同治《武陵县志》记载，唐待徵撰写的是《德山志》，“唐待徵，字晓村，雍正元年诏举孝廉方正，邑绅推荐之。辞不赴，以明经选湘阴教谕，著有《德山志》《梯霞堂集》”^③。之所以会有将《桃源洞天志》的作者归为唐待徵、释兰岩二人的说法，当是研究者在阅读嘉庆《常德府志》时因不慎产生的讹误。嘉庆《常德府志》载：“唐待徵，《德山志》四卷，杨绪同辑。释兰岩，《桃源洞天志》二卷。”^④这段话刻在同一排，其中唐待徵刻在排首，释兰岩刻在下半排，中间用空白隔开，阅读时不注意的话，容易误认为唐待徵和释兰岩二人同撰《桃源洞天志》。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桃源洞天志》又叫《桃源洞志》。《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光绪《桃源县志》称该书为《桃源洞志》，而今天的各种文献则多称其为《桃源洞天志》。湖南图书馆馆藏《桃源洞天志》的“花源藏板”的扉页刻的是“桃源洞志”，书中内容页的中间刻的是“桃源洞天志”。关于这一情况，释兰岩在其《桃源洞天草述》中有着较为清晰的说明。释兰岩在文中称桃源洞为桃源洞天，并指出桃源洞之所以未能预列中国道教的三十六洞天，是因为后世在理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时，因“托物言志”理论的影响习惯性地将它解释成“情郁于内，有托而传”的作品，从而认为桃花源是陶渊明心有不甘，哀怨郁结于心的幻想世界，桃花源洞只是陶渊明向壁虚构的乌托邦和子虚乌有的象牙塔。因此，桃源洞错失了成为三十六洞天的机会，“洞天一席，疑为乌有”。释兰岩认为桃花源洞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他在详致探讨武陵人进入桃花源的细节后指出，“仙凡咫尺，匪诬也”。释兰岩还对南阳刘子骥沿着武陵人留下的标志前往桃源洞不得其门而入的原因作了合理的推测，“或以晋太元时，沅之南悉武陵郡，所称洞天都无定处”^⑤。在释兰岩看来，神仙洞府迥异于现实中的山洞，它不是固定于一处，而是如流水般可以流动变幻的。因而释兰岩总结出桃源洞可跻身于道教三十六洞天之列，故在书中释兰岩一直称其为桃源洞天。

事实上，根据《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云笈七签》所载的三十六小洞天，桃源洞天实为第三十五洞天，“第三十五桃源山洞，周回七十里，名曰白马玄光之天，在朗州武陵县”^⑥。《洞天福地记》称桃源洞为“白马玄光之天”，名列三十六洞天。而且，在释兰岩纂辑的有关桃源洞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到桃源洞为第三十五洞天，如李白《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源洞序》：“列三十六洞，别为一天。”^⑦杜维耀《桃源洞说》：“古称桃源洞，又称秦人洞，又称第三十五洞天。”^⑧可以看出，释兰岩在纂辑《桃源洞天志》时，既没有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又没有仔细阅读其搜集的诗文资料，而仅根据己意强作解释，这是值得后世修志者引以为戒的。

① 金玉满编：《中国旅游文献书目选编》，中国旅游出版社，1986年，第253页。

② 寻霖、龚笃清编：《湘人著述表》，岳麓书社，2010年，第875页。

③ 恽世临修，陈启迈纂：同治《武陵县志》卷39《人物志》，同治二年（1863）刻本，第534页。

④ 应先烈修，陈楷礼纂：嘉庆《常德府志》卷19《艺文考》，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第618页。

⑤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第3页。

⑥ 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27《洞天福地》，中华书局，2003年，第4页。

⑦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第12页。

⑧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第18页。

值得注意的是，释兰岩在纂修《桃源洞天志》时，还请求当时的地方守令陈浩写过序。“寺僧一休袁洞天诗文，自渊明以下若干篇为卷一……以余之游且记也，因邑宰屈君，丐序于首。”^①但该文最后却未被收于《桃源洞天志》中。释兰岩请陈浩写序，是因为陈浩曾经在游览桃花源后，写下了一篇《桃花源后记》。该文文采飞扬，乃是志怪小说的经典。文章仿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客”重游桃花源，途中偶遇三尺小人，“即视其人，仅三尺许，貌甚古”，后闯入桃源古洞，“折荆拔缠互，侧身仄尺，攀缘而登”，欣赏桃源洞的风光，“循阡陌，农夫耘锄，妇子馈饷，纷纷往来，笑语亲密”^②。因陈浩游览时流露出对桃花源的浓厚兴趣和欣赏之情，故释兰岩才有此请求。然而，陈浩在《桃源洞天志序》却说桃源洞天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余窃意桃源之名，脍炙于世者千数百载，其洞壑深邃奇丽，必有大过他土者。及登山，仅陂陀耳，无灵崖异宅足以幻人耳目。”陈浩指出自己抱着期望之心前来，结果却发现桃源洞只是一个小山坡，“仅陂陀耳”，并无特别之处，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还不如自己家乡门口的山峰，“较之吾黔飞云牟珠之胜，百不逮一”。陈浩总结出桃花源只是古人用文字堆砌出来的一个名胜，“未尝不叹古人文字游戏之物而后人凿而指之，何不达也”。在序文的结尾处，陈浩还颇为挑衅地邀请释兰岩去参观他家乡的风景，以此和桃花源来作个比较：“余虽不有渊明之笔，犹乐为僧一一指点，而传之持归，以视桃源为何如也？”^③因为该序文对于桃源洞天的揶揄和调侃，释兰岩在后来实际刊刻《桃源洞天志》时将此序删去，仅保留了自己的《桃源洞天草序》。

概言之，《桃源洞天志》为释兰岩独自一人编纂而成。释兰岩，字一休，长期隐居在桃源洞天，“一休之宅于洞天者数十年矣”^④，后担任桃源洞大士阁的住持。释兰岩根据自己的长期生活体验，搜罗各种文献资料，并亲自绘图，纂辑而成《桃源洞天志》，“自渊明以下若干篇为卷一，而并以图，自桃城迤水溪，历历在焉”^⑤。《桃源洞天志》成书于乾隆十九年，并在当年刊刻印刷，“始修于乾隆十九年，是年成书付梓，纪事止于当年”^⑥，这是桃花源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二 正名心态下的方志纂辑

关于《桃源洞天志》的纂辑缘由，释兰岩在其《草述》中有着较为清晰的表达。首要原因在于因年岁久远，很多有关桃源洞天的诗文资料在历史中泯灭不见，为了抢救文献资料，保存桃源洞的吟咏诗文，释兰岩特纂辑志书，以资纪念。“自靖节后所为诗文千百余岁，散而不集，久而愈湮，岂不惜哉？”^⑦陈浩在《桃源洞天志序》中也指出：“顾自唐以来碑记之多诗词之丽，皆散漫无收拾。”他称赞释兰岩编纂志书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常重大的，“存而志之，固转饭栽田者之责也，则僧之用心亦可嘉矣”^⑧。为后世保留一份资料，存下一份记忆，这是释兰岩纂辑乾隆志的一个重要目的。

《桃源洞天志》在游览向导方面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名山胜水的志书，往往夹杂着辅助

① 唐开韶、胡焯编纂：《桃花源志略》，第128页。

② 唐开韶、胡焯编纂：《桃花源志略》，129页。

③ 唐开韶、胡焯编纂：《桃花源志略》，第128页。

④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第3页。

⑤ 唐开韶、胡焯编纂：《桃花源志略》，第128页。

⑥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28卷《文物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706页。

⑦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第3页。

⑧ 唐开韶、胡焯编纂：《桃花源志略》，第128页。

游览、襄理景色的效果。董天工在纂辑《武夷山志》时说：“武夷峰峦断续离奇，有靛面之山而必须盘绕他处以达者，今皆各注条下，俾游者临歧藉为导引，庶不至如桃源迷津也。”^①董天工认为武夷山的道路过于离奇变幻，游者容易在蛛网般的路途中迷失自己，因此他编纂《武夷山志》的一大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游客更好地游玩武夷山。谭鉴的《西山志序》在简介《西山志》的创作缘由亦说：“俗人览其好景，忘其好诗，买椟还珠，真堪打腹。得此批评传布，始不为糊壁之资。”^②过往游客在把玩西山美景时，常常流连于单纯的景色欣赏，“览其好景，忘其好诗”，难以达到文化与景物的双重审美，而《西山志》的编纂，可以为文人雅士泛游西山，提供一份很好的助力。葛天柱《桃花源志略序》也说道：“是匪为游览之所资也，纪其山川风俗，耆旧人事，博采古今文词，览者有所考焉。亦一道同俗之一助也。”^③《桃源洞天志》的修纂，也有着辅助游览的目的。陈浩在其序中便指出：“图与志者，何为也哉？……而游斯胜者，欲按图以问津。”^④释兰岩在《洞略》中也说：“今略举梗概，以俟游览者考焉。”^⑤释兰岩为了方便游者观览桃源洞天，还特意手绘了7副板画，将桃源洞天各处景观的位置和行进路线一一刻画出来，并撰有《图说》一文，专门解释其绘画的意图与原则。释兰岩指出桃源景色落英缤纷，溪水云雾朦胧缥缈，“未至仙源，蚤已骨戛青玉，身入镜中矣”。景色之流连忘返，山路之崎岖曲折，故释兰岩特绘图画，为后世游者作向导之用，不致于让他们在崎岖小路中迷失方向，“前后之按图问津者，当无复迷途之叹也”^⑥。

《桃源洞天志》的编纂还有一个没有在序中说明，但却更为重要的缘由，那就是为桃源县的桃源洞正名。在释兰岩修志之前，明代就曾有过一部《桃源洞天志》，它的全名是《齐云山桃源洞天志》，该书是由明代崇祯年间的鲁点编纂而成，其桃源洞天指的是安徽齐云山中的桃源洞天。据许士柔《桃源洞天集序》载，天都黄氏的吉甫先生，即后来的无心道人，少慕道术，遍游诸山，返乡后“选胜齐云，筑桃源诸宫，延邈邈老人而师事之”。桃源宫风景殊丽，许士柔感叹道：“桃源，信齐云又一洞天也。”^⑦这即是齐云山桃源洞天名字的由来。

齐云山的桃源洞天在明代有着偌大的名声，明末大学士施凤来作《桃源洞天记》，称“天地之灵气突涌为齐云岩，中间为桃源洞天”；翰林修撰韩敬的《桃源洞天积储记》说“诚尘寰福地，人世洞天也”^⑧。名士大儒的文章为齐云山的桃源洞天增添了声望，而著名道士紫云主人、明宗室朱濬为此桃源洞天站队背书，更是让其成为当时闻名天下的道教圣地。在释兰岩编纂《桃源洞天志》以前，社会上公认的桃源洞天乃是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下的桃源洞天。只有等释兰岩创制出《桃源洞天志》后，高举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旗帜，方才将社会的认知扭转开来，让普罗大众认可真正的桃源洞天是在湖南省桃源县。

故释兰岩在辑纂有关桃源洞天的艺文时，积极收纳各种赞成桃源洞天只存在于桃源县的辩说和论议，并设立“序”“辨议”“说”“考”等名目，来强调桃源县桃源洞天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释兰岩在序中收录了3篇序言，其中前两篇是强调桃源洞天的仙境特征和逍遥属性，如李白的

① 董天工纂：《武夷山志》卷首《凡例》，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第55页。

② 欧阳桂纂：《西山志》卷首《序》，乾隆三十一年（1766）刻本，第5页。

③ 唐开韶、胡焯编纂：《桃花源志略》，第2页。

④ 唐开韶、胡焯编纂：《桃花源志略》，第128页。

⑤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第5页。

⑥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第11页。

⑦ 鲁点纂：《齐云山桃源洞天志》卷首《序》，崇祯十年（1637）刻本，第3页。

⑧ 鲁点纂：《齐云山桃源洞天志》，第20—22页。

《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源洞序》说：“卷舒天地之心，脱落神仙之境，武陵遗迹，可得而脱焉。”江盈科的《桃源洞天草序》言：“桃源洞天，图经所称第三十六洞天外别一洞天也。……然则洞天之境，四序流易，吾人乘而行乐，与景俱适，何非逍遥婆娑时耶？”第三篇的名称和前两篇有很大的区别，不再是“桃源洞序”，而是一篇《渊明祠序》，释兰岩在“序”中选取这篇文章，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篇文章的内容是辩说桃源洞天的真实性，“曾有神仙两字，为来时口舌否？韩苏两君子挟微言醒惑俗，遂以渺茫荒唐目之……莫须有三字，宁足服天下耶？……径遂谓渊明记中事为荒唐幻说，此何异井蛙之不可语于海，夏虫之不可语于水也。……安知洞天胜地不如昔所云云。”①《渊明祠序》指证往昔韩愈、苏东坡驳议桃源洞天莫须有的说法并不可信：“莫须有三字，宁足服天下耶？”桃源洞天的仙境特性让其不能够根据日常的生活常理来推断，不能因为其罕见稀有便断定它不存在。《桃源洞天志》“说”中的《秦人洞说》继承这种推理逻辑，认为当日陶渊明所描绘的桃源洞乃是仙境，仙境与尘世不同，故有种种不可思议之事。“当日渔郎，实有此事，其所至之境，如《记》称：‘鸡犬相闻，阡陌交通。’实是仙界。盖仙界者，不离人世，不即人世，有无之间，真幻之际。”②

三 僧人编纂的道教洞天方志

桃源洞天自唐代兴盛起来后，便一直是一座道教名山，然而最后成书时的《桃源洞天志》却是由一位僧人来纂辑，这不得不说是一大奇事。桃源洞天的第一座建筑乃是道观桃川宫，不过关于桃川宫的兴建时间，各种文献记载不一，争议不休。俞益谟的《重修桃川宫碑记》认为桃川宫兴建于秦时，“桃川宫历秦汉迄今，近二千余岁矣”③，此说颇谬，秦时道教都不存在，何来道宫之说。嘉靖《常德府志》则主张兴建于晋时，“桃川宫，县西南二十八里，晋人建”④。明人印伟则主张桃川宫的兴建是宋代政和年间的事情，他的《重修桃源万寿宫记》说：“辰人翟童入山修炼，白日羽升，在唐之时，然未有宫宇也。”⑤而释兰岩在《桃源洞天志·修建》中则认为桃源洞天在唐以前并无像样的建筑，直至唐代中叶的道士黄洞源、翟柏庭学道于此，才逐步开始了桃源洞天的兴建规划，“自黄洞源、翟柏庭相继控鹤于兹，刺史温造纪其事于桃川宫。宫宇之建，当在大历贞元间”⑥。释兰岩依据唐时文献所载的黄洞源和翟柏庭白日飞升事件，来判断桃川宫的兴建时间，较为可靠。湖南常德桃花源的扬名，主要依靠的是刘禹锡的诗文贡献。刘禹锡贬谪常德期间，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桃源诗篇，形塑了一个人间仙境的桃源圣地，这才让湖南桃花源走向了整个中国。因此，桃花源洞的建筑修建，很大可能是在刘禹锡之后，也即释兰岩所说的大历贞元间。

自唐代桃川宫兴建后，桃源洞一直是一座道教信仰圣地。宋代政和年间，广南西路转运副使张庄开始在桃源洞构建景明万年殿、福寿二星经钟楼，并修有斋寮、廊庑、厨库，面积大至1330楹，第二年宋徽宗御赐“桃川万寿宫”匾额。淳祐元年（1241），桃川宫的北面又新建了武当行宫。元末大乱，所有宫殿在战乱中全部遭到焚毁。明代洪武年间，道士龚贵卿在旧址上修缮道宫。

①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第12—15页。

②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第19页。

③ 唐开韶、胡焯编纂：《桃花源志略》，第120页。

④ 陈洪谟纂：《常德府志》卷20《方外志》，明嘉靖刻本，第595页。

⑤ 唐开韶、胡焯编纂：《桃花源志略》，第59页。

⑥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第7页。

景泰六年(1455),道士谢智常建立数楹殿宇,不久又为风雨毁坏。成化十八年(1482),道士冯信通在旧址重修三清殿、龙虎殿。弘治十四年(1501),道士谭常崙修了两层山门、一座清风桥。正德十四年(1519),道士曾世显修缮武当行宫的神像,并题额为“元岳遵太和始”。万历年间,刘陶宇、李廷谟、刘之龙等地方官员又先后构室建房,扩屋增亭。可以看出,在万历以前修缮桃源洞天的宫殿时,基本上是以道宫为主。

然而到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情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当时的湖广布政司参政兼分巡湖北道使郭显忠在桃川宫的基址上改建了“大士山堂”,也就是后来的“大士阁”。据郭显忠《桃川大士山堂记》载,郭显忠巡游至桃川时,山僧张定性向郭氏汇报“欲作大士像于方丈,为此方祈福”,恰好郭氏家中有数位先辈信奉佛教大士,“思先恭人事佛惟谨,毕生蔬素,邑中背坐大士,其所严饬也”,因此郭显忠答应了山僧的要求,“于是许以建创”。郭显忠为大士阁的兴建“捐赎醵三十”,还要求当地守令亲自督促此事,“命俞丞董其事”。大士阁建成后,郭显忠亲自前往祈祷,并称赞桃源一地的太平安宁乃是大士的功德,“此大士功德”^①。可以说,将桃源道宫改成大士阁是在官方的主持下进行的,其正当性获得了官方的背书和认可。

此后直至清朝,桃花源的信仰一直都是由佛教所占据,释兰岩称:“我朝平定后,住持渐次修补,而较前不无远逊云。”^②地方守令多次捐资重修佛寺殿宇,康熙四年(1665),县令陈洪范募集资金修缮桃川古殿。道光二十九年(1849),桃源县令朱元增认为桃源古庙乃是名门大庙,非得道高僧不得担任住持,特意聘请德山乾明寺的常林担任大士阁住持,“以桃洞古名胜地,住持非高宁不可,物色之,得常林”^③。咸丰八年(1858),时任县令熊镇南主持了大士阁的修缮。同治四年(1865),桃源县令孙桐生再度修缮大士阁。清代对于桃源宫殿的修缮以佛教大士阁为主,并多次获得地方守令的资助。

民国时期,桃源洞的信仰再度更改为道教圣地。民国元年(1912),大士阁毁于火灾。民国3年,当地县令杨瑞贻在大士阁故址重修楼台观宇,并命名为“桃花观”。杨瑞贻将大士山堂更改为隐君子之堂,并以陶渊明作为祭祀对象。从此以后,道教又取代佛教成为桃源洞的主要信仰对象。

综上所述,桃源洞在唐代中叶开始兴盛起来后,一直以道家为主要信仰,并跻身于道教三十六洞天之列。然而到了万历三十七年,桃源洞兴建了具有佛教意蕴的“大士阁”,并延续至整个清代,这一时期桃源洞的主要信仰是佛教。直至民国元年,大士阁毁于火灾,重建了具有道家色彩的“桃花观”,桃源洞又开始了道教信仰。释兰岩在纂辑《桃源洞天志》时,桃源洞正好处于佛教香火鼎盛时期,所以出现了以僧人纂辑道教洞天志书的奇事。《桃源洞天志》的很多邑人文章具有很厚的佛教风格,如田盈科的《秦人洞说》,就用佛教的缘分说来阐释当日渔郎为何能入桃源洞,又为何后来再也进不去了,“缘合则不求诣而自诣,渔郎之无心而至是也。缘尽,则求诣而不可诣,渔郎之复往而迷是也”^④。

《桃源洞天志》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即释兰岩亲手绘制了7副板画。这7副图画之间层次分明,由远到近地描绘了出入桃源洞的路线,娓娓道来,令观者仿若置身于桃源之间。在绘图方面,释兰岩坚持纲举目张的原则,“因仿刘宾客统八景,以桃源佳致之意”。北宋著名山水画家宋迪曾作《潇湘八景图》,从8个角度来展演潇湘之地的美色,其中以刘禹锡的“平沙落

① 唐开韶、胡焯编纂:《桃花源志略》,第64页。

②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第8页。

③ 余良栋修、刘凤苞纂:《光绪桃源县志》卷10《人物志》,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第678页。

④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第19—20页。

雁”作为提纲挈领，纲举而目张。释兰岩效仿潇湘八景的构思创意，从7个视域来演示桃源之景，尤其是在图六和图七之中，释兰岩特意标注出桃源的4个景观：梅溪烟雨、楚山春晓、漳江月夜、潼沔晚渡。就板画的整体特色来说，释兰岩所绘之图清晰明了，水中之舟，舟中之人，栩栩如生，“图始潼沔，讫于水溪，环洞之前后左右皆若列眉展卷”。整体构思巧妙无比，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出桃源之地的湖光山色，在没有运用轻重手法的前提下，仍然体现出了画面的层次感和逻辑性，型塑了一幅意境高逸的桃源之景，颇具禅味，“历历在目，恍有渔郎鼓枻”^①。释兰岩以一介僧人而有此图画造诣，实在是颇为难得。

在体例安排方面，《桃源洞天志》并不分卷，采用以章节来标识内容的方式。全书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录的是对桃源洞的考辨类文章，中间部分是释兰岩亲手绘制的7副图画，后面是艺文志。释兰岩将桃源洞的考辨类文章按照文体的不同，分为了序、辨议、说、考、赋、书6种形式，整体逻辑较为清晰明了，故《湖南省志》称其“是志体例简明，条理清晰，内容丰富，文笔流畅，考证精审，是名胜古迹专志佳槩”^②。它在编纂方面的实地性也为后世所称赞，其内容为多种志书所引用。如光绪《桃源县志》便全文引用了《桃源洞天志》的《途胜》和《图说》，可见《桃源洞天志》的实录效果。而且，此书对后世的《桃花源志》系列志书的影响很大。如清末唐开韶、胡焯编纂的《桃花源志略》，就是在《桃源洞天志》基础上纂辑的，葛天柱《桃花源志略序》：“乾隆年间有释一休，著为《桃源洞天志》，今因而广之，乃大备焉。”^③

然而，《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对《桃源洞天志》的整体评价不高，其文曰：“其体例丛杂，盖山志之最劣。《桃花源记》，盖渊明遐想得一地如桃花潭者以避世耳。”^④《提要》不但认为《桃源洞天志》的体例存在很大的问题，还否认了其纂辑意义和价值。在《提要》看来，桃花源仅是陶渊明无聊时的遐想之作，并非世传的名山胜地、神仙洞府，“信神仙之所居，盖绿萝之擅名”，实在是没有纂辑方志的必要。《提要》立足于真实性，否认了《桃源洞天志》的存在价值，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历史观念。事实上，名山志跟郡县志有着很大的区分，董天工在纂辑《武夷山志》时就发现，郡县志的目标在于“考鉴得失，昭垂法戒”，所以记载的内容要求真务实，不得向壁虚构；而山水志的目标在于“搜罗载籍，增广见闻”，因此对于那些有所出处的不经之谈、无稽之物，仍然有记录的必要。《桃源洞天志》作为一部供游人赏玩的名山志书，它追求的就是给人精神上的惬意和愉悦，而不是传统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如果能够认识到名山志书的特性，《提要》就不会出现这种否定性的认识了。

总而言之，释兰岩以一介僧人的身份去纂修道教洞天的方志，极具文化史意义，反映了我国宗教关系和谐的一面。我国传统时代的宗教多元并存、和合共生，以互相尊重、彼此包容的态度映照对方，故高僧可以去为道教洞天纂修方志，道士也可以去替佛寺古刹修纂志书，二者之间是和衷共济、相得益彰的，而不是矛盾对立、冲突碰撞的。这对我们今天促进宗教和谐，凝心聚力共建美好社会，具有很好的启示。

（作者单位：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

本文责编：周全

① 释兰岩纂：《桃源洞天志》（不分卷），第11页。

②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28卷《文物志》，第706页。

③ 唐开韶、胡焯编纂：《桃花源志略》，第2页。

④ 柯劭忞等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史部，第1册，第276页。